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0.02.005

论“中国奇迹”的经济转型

顾书桂

(上海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要: 中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但人均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 因此“中国奇迹”只是阶段性成功现象。2007年以来, 中国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下跌, 至今没有改变,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继续取得成功, 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为中国经济增添新的动能。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和基础是体制创新, 技术创新则是体制创新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 中国奇迹; 经济增长方式; 体制创新; 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 (2020) 02-0040-13

打开中国知网, 在学术期刊、博硕士论文、会议以及报纸范围内, 检索篇名包含“中国奇迹”的文献, 可以发现“中国奇迹”最早出现于1995年, 是与国内学者吴焦苏试解“弗里德曼难题”联系在一起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中国改革开放15年后说, “在中国改革成功之后, 中国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把这场改革的整个过程描述下来, 为什么能走向成功, 怎么走向成功的……中国学者有可能就此得一个诺贝尔奖”^[1], 这就是所谓的“弗里德曼难题”。从那以后, 中国奇迹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相比25年前在国内外显然有更多的解读。本文拟从动态的角度出发, 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只是一种阶段性成功追赶, 远没有像日本一样达到或超越欧美的水平; 由于改革开放远未完成, 中国经济自身依然缺乏良性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中国经济的最终成功还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 因此中国奇迹的延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难。

一、文献综述

对中国奇迹的成因, 学者们一般归功于系统性因素, 如加里·杰里菲(1996)^[2]、宋德勇(1999)^[3]、李绍祝(2003)^[4]、徐湘林和李国强(2007)^[5]、李海英(2010)^[6]、李佐军(2015)^[7]等。当然, 也有很多学者只强调某一个或很少的几个方面, 如徐勇(2010)^[8]、欧羽霏和马永伟(2017)^[9]均强调农民理性与工业社会优势结合的叠加优势; 卞思捷(2011)强调出口导向政策^[10]; 辛向阳(2011)^[11]、周文和冯文韬(2018)^[12]强调政治体制优点; 盛洪(2011)强调经济自由主义^[13]; 张晓山(2013)强调廉价

收稿日期: 2019-09-09

作者简介: 顾书桂(1970-), 男, 江苏姜堰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金融学、城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劳动力和廉价土地^[14]；都阳等（2014）强调城乡劳动力流动^[15]；陈书荣和陈宇（2015）强调土地财政^[16]；朱海就（2016）强调市场化^[17]；林毅夫（2018）强调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18]等。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中国奇迹美中不足的研究。如乔治·吉尔博伊（2004）认为，偏好国有企业和外国投资使中国产业被效率低下但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实力渐强的外国企业所统治，忽视技术创新使中国经济前景黯淡^[19]；齐物论（2006）认为，中国奇迹伴生众多的负面现象，如劳动力过剩、国企工人下岗、地区差距过大、农民负担过重、城乡壁垒森严、贫富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流失、银行坏账、股市丑闻、不动产泡沫、权力缺乏监督、社会道德危机等^[20]；杨文进（2014）认为，由于牵引经济增长的技术来源以引进和模仿为主，中国未来持续下降的经济增长率也许会缩小中国与美国经济的差距，但还无法取代美国经济的地位^[21]等。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中国奇迹的延续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因而是不容易实现的。如姚洋（2004）认为，中性政府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中国必须深化改革，经济去国家化，政治过程民主化，才能延续中国奇迹^[22]；张景安（2011）认为，中国缺乏核心技术实现经济内生增长发展，必须从学习引进转向创新引领^[23]；曹秋（2012）认为，中国奇迹背后存在一个产权初始配置合法性缺失亦即公正性缺失的严重问题，只有实现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才能实现中国奇迹的继续^[24]；燕继荣（2012）认为，中国奇迹源于中国财富生产和积累共识带来的经济增长，延续中国奇迹还需要财富分配共识^[25]；侯发亮（2015）认为，中国奇迹是总供求共同扩张的结果，延续中国奇迹必须对总供需的内在结构进行改善，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也是中国现阶段“调结构、转方式、促增长”的理论基础^[26]；蔡昉（2015）则强调，以人城镇化为核心的包容性发展是中国奇迹延续的关键^[27]；何磊和姚金伟（2016）认为，政府主导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前提，延续中国奇迹需要通过建立政治新常态和经济新常态，包括规范市场、强化法治、建立服务型政府和专家治国体制^[28]；迈克尔·扎库尔（2017）认为，中国奇迹的继续依赖于消费、技术与创新、先进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升级^[29]等。有的学者对中国奇迹的前景充满信心，如张久安（2018）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奇迹的一种延续^[30]等。有的学者对中国奇迹的前景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如华民（2011）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机会不均等，这会使中国奇迹延续的必要条件——社会激励机制消失^[31]；张炜（2010）认为，虽然中国具有通过转变经济结构，将发展的中心转变到以国内消费为主的经济潜力，但是中国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构架缺乏调整国内现有利益格局与产业结构的能力，或者说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密切结合使得内需取代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延续中国奇迹很难^[32]等。事实上，从2007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每况愈下的经济增长率看^[33]，中国奇迹的延续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中国奇迹需要增添新的动能。

二、中国奇迹出现的积极因素

中国奇迹可以从下面一些指标看出端倪。按当年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978年是3 678.7亿元人民币，2016年是744 127.2亿元人民币，38年增加201倍；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则增加203.6倍，而同期人口仅增加43.64%^①。按美元计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2001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是311 214.4亿美元，美国是100 652.7亿美元，中国是11 590.3亿美元，中国占世界的3.72%，相当于美国的11.52%；世界人均国民总收入是5 120美元，美国是34 280美元，中国是890美元，中国占世界平均值的17.38%，相当于美国平均值的2.60%^②。2016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是756 416亿美元，美国是185 691亿美元，中国是111 991亿美元，中国占世界的14.81%，相当于美国的60.31%；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0 164美元，美国是57 467美元，中国是8 123美元，中国占世界平均值的79.92%，相当于美国平均值的14.14%^③。15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增加了2.98倍，由相当于美

国经济的 11.52% 变为相当于美国经济的 60.31%；尽管人均指标有差异，但增长同样可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无疑是成功的，称其为中国奇迹也不为过。

综观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中间历经“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节企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最后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市场体制并融入世界经济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与世界（主要是欧美）接轨，必须走欧美经济走过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道路。恰恰是在这三个方面，中国先天因素和后天条件俱备，而且取得了竞争优势，这也是中国奇迹出现的基本因素。

（一）中国始终存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潜在条件

与苏联相比，中国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时间并不长，也短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经济转型绩效优于苏联国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34]）。而且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只在城镇实行全民所有制，广大农村则是集体所有制的天下，这意味着至少城乡之间必须实行某种遵循价值规律的物资交行为。事实上即使在城镇内部，全民所有制的推行也经常受到发展水平低下的生产力阻碍。“经济治理整顿”“反资防修”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是中国城镇市场经济大量残余的最好例证。1978 年后承包制首先在中国农村推广并取得成功，说明即便是层次较低的集体经济也没有在中国广大农村扎根，市场经济意识在中国农村一直是深入人心的。

中国城市体制改革晚于农村，是在农村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尽管之前已经有东欧、苏联特别是南斯拉夫的改革经验借鉴，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在面上取得成功。相反在城镇，伴随着乡镇企业、村办企业、街道办企业这一类非公非私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城镇全民所有制经济迅速溃退，大量灰色资金合法地流向个人。加上计划经济的特权属性，拥有大量资金和资产的个人背后都有权力做后盾，这在法治不完善的中国对于有效维护个人产权是极为必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后继乏力的乡镇企业最终被产权明晰的私营企业取代，苏南模式走进历史，温州模式走上前台。1992 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传统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最终抛弃。全民所有制企业自此某种程度上承担着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成本责任，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真正的统治地位。

（二）包括东亚雁行产业分工在内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极佳的机会

中国对外开放最早是从 1980 年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的。至 1993 年，基本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这段时间正值国际产业转移大潮中雁形产业发展模式在东亚的最后形成。二战以后，一方面由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冷战的需要，国际旧产业开始由欧美向亚非拉特别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转移，逐步在远东地区形成以日本为雁头，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东南亚、中国内地甚至印度为雁尾的雁形产业国际分工格局。在雁形产业国际分工格局中，每个国家单一产业发展都经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国民经济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由轻工业化向重工业化甚至高加工度化提升，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应该说，这种雁形产业分工模式极其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初步成功。受计划经济和人口政策的影响，中国当时就业机会稀缺，参与国际分工不仅可以将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变为宝贵的劳动力资源，还可以通过干中学提高人口素质，获取必要的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几乎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外资获得超国民待遇也是普遍现象。在引进、管理外资的过程中，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对外开放的资本和实力。

中国正式融入世界经济以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 WTO）为标

志。资料显示，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06.4亿美元，2000年为4743.0亿美元，2015年上升到39530.3亿美元，2000年和2015年分别为1978年的23倍和192倍；服务进出口方面，1982年为45亿美元，2000年上升到707亿美元，2016年为6575亿美元，34年增加145倍；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9—1984年一共为41.04亿美元，2000年为407.2亿美元，2015年上升到1262.7亿美元，2015年是2000年的3.1倍；对外承包工程方面，1979—1981年完成营业额仅仅1.23亿美元，2016年已经上升到1594.17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方面也从1984年在外人数2.76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59.60万人^①。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不仅体现在中外经济交流上，也体现在中国内部经济活动上。2016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货物为16875亿美元，其中出口为9167.5亿美元，进口为7707.5亿美元，分别占当年中国进出口货物36855.6亿美元、出口20976.3亿美元、进口15879.3亿美元的45.79%、43.7%、48.54%。外商投资企业几乎占据了中外经济交流的半壁江山，很多外商投资企业甚至是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例如，中国高端医疗器械市场的七成产品直接被外国企业垄断^②，采棉机、高端农机、燃机、食用油、汽车电子、海洋电缆等市场都被外资或外国企业高度垄断。中国经济真正做到了“在本地区所有起飞的国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对外资充分开放”^[20]。

（三）中国式土地财政为全球产业转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招商环境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需要在地理上集中，工业化所需要的城市化在中国是通过土地财政来推动和完成的。中国式土地财政的核心内容是，发达地区政府预算内收入依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预算外收入靠土地出让金，城市扩张主要依托与土地紧密相关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土地出让金及土地抵押贷款成为城市和其他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35]。根据陈书荣和陈宇（2015）的说法，土地财政在两个方面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一是土地财政加快了经济开发区和城市新区建设，促进和吸引了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企业家的集聚，使经济开发区和城市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土地财政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发展，充分发挥了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16]。从客观效果看，中国式土地财政虽然有城镇政府粗放经营城镇土地的嫌疑，但为了招商引资，城市工业用地价格一降再降^[36]，从成本价降到零地价屡见不鲜，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确实有利于接纳国际夕阳产业进入中国。

二战之后国际产业转移有很多原因，其中不能流动的生产要素成本高企是最突出的，因此降低劳动力成本、降低土地成本、减少环境污染是国际投资最基本的目标，而这也是中国最不缺少。这注定了中国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时具有必要的竞争优势（见表1），注定了中国按照雁形产业国际分工模型对外开放必然取得成功。从这个角度讲，只要中国的雁形产业发展模式不受打扰，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中国奇迹是没有疑问的，也是没有难度的。正是依靠国际稀缺的生产要素优势，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表1 1979—2016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①

年份	1979—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金额	41.04	19.56	22.44	23.14	31.94	33.92	34.87	43.66	110.08	275.15	337.67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金额	375.21	417.26	452.57	454.63	403.19	407.15	468.78	527.43	535.05	606.30	603.25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金额	630.21	747.68	923.95	900.33	1057.35	1160.11	1117.16	1175.86	1195.62	1262.67	1260.01

三、中国奇迹的美中不足

中国奇迹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无疑是成功的,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则问题严重。宋养琰(2008)虽然承认分配不公、城乡和区域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污染、经济增长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下、体制和机制不完善、贪污腐化等问题的存在,但认为这些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可以最终解决的^[37]。毫无疑问,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中,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又消失了,但也有很多问题始终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甚至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它们造成中国奇迹的美中不足。

(一) 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表2中各国的基尼系数是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从低到高的两个标准排序的。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其基尼系数都很低,社会也比较稳定;美国、新加坡、俄罗斯基尼系数较高,但通过增加阶层流动,注重民生工程,增强意识形态控制,社会也基本稳定;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的一定是那些基尼系数较低的国家,如埃及、印度、印尼、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越高,社会稳定性越差,墨西哥、巴西、南非差不多是发展中国家社会治安差、政局不稳定的典型代表。

表2 世界典型国家基尼系数^④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国名	年份	基尼系数	国名	年份	基尼系数	国名	年份	基尼系数	国名	年份	基尼系数
德国	2011	0.30	澳大利亚	2010	0.35	埃及	2008	0.31	阿根廷	2014	0.43
日本	2008	0.32	美国	2013	0.41	印度	2011	0.35	墨西哥	2014	0.48
法国	2012	0.33	新加坡	1998	0.42	印尼	2013	0.39	巴西	2014	0.51
英国	2012	0.33	俄罗斯	2012	0.42	尼日利亚	2011	0.40	南非	2011	0.63

再看中国的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⑤,2014年为0.469,2015年是0.462^⑥,2016年是0.465^⑦,虽然逐年有所下降,但降幅并不明显,而且无论是跟大国比还是跟小国比,数值都仍然很高。再考虑到中国地区发展差异大,人口数量众多,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⑧。

(二) 农民城市化进程受挫,规模庞大的农民工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

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部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的历史,农民城市化是近现代经济史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中国的农民城市化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如火如荼,大量农民在就业岗位的吸引下离开农村到城镇就业;另一方面,僵化的户籍管理制度难以接纳如此多的新移民,从而不得不将他们拒之门外,于是中国出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新居民形式——农民工,其经济关系在城镇,政治和社会关系在农村。改革开放22年后的200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21亿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流动人口迅猛增加,2014年一度高达2.53亿人,比2000年翻了一倍多,2016年仍然保持在2.45亿人的高水平。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在2016年已经相当于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2.6亿人),仅次于印度(13.2亿人)、美国(3.2亿人),比巴西(2.1亿人)、孟加拉(1.6亿人)、巴基斯坦(1.9亿人)、日本(1.27亿人)、俄罗斯(1.44亿人)、尼日利亚(1.86亿人)还多^⑨。根据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低于一定的限度,不但城镇产业升级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也不能启动,即刘易斯拐点不能实现^[38];即使根据西奥多·W.

舒尔茨（2006）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尽可能置换和改造传统劳动力也是必要的^[39]。存在规模庞大的农民工显然是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大阻碍。

（三）人才流失与企业创新的矛盾突出

以高技术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构成为例。表 3 显示，1995—2015 年的 21 年间，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比重变化不大，前者最高 86.2，最低 82.7，后者最高 17.3，最低 13.8，变化较大的是高技术产品比重从 1995 年的 11.4 上升到 2010 年的 30.4，不过 2015 年仍为 30.4。进一步分析，在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和初级产品比重下降一样明显，只不过被进口贸易中的工业制成品比重下降和初级产品比重上升抵消掉了。需要重视的是，虽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增长速度，但 2015 年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依然明显高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而且两者比重都不高，前者 2015 年为 32.7，后者 2015 年为 28.8，甚至低于 2010 年的 31.2，显示中国依然是一个低技术进口大国，而且高技术产品进口刚性强，所谓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则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如果考虑到 2016 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占全国 46%、出口占全国 44%、进口占全国 48.54%，这一结论会更加明显^①。

表 3 1995—2015 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进出口贸易构成变迁^①

年 份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商品进出口贸易构成（100）	工业制成品	83.6	84.8	86.2	82.7	85.4
	高技术产品	11.4	18.9	29.3	30.4	30.4
	初级产品	16.3	15.2	13.8	17.3	14.6
商品出口贸易构成（100）	工业制成品	85.6	89.8	93.6	94.8	95.4
	高技术产品	6.8	14.9	28.6	31.2	28.8
	初级产品	14.4	10.2	6.4	5.2	4.6
商品进口贸易构成（100）	工业制成品	81.5	79.2	77.6	69.0	71.9
	高技术产品	16.5	23.3	30.0	29.6	32.7
	初级产品	18.5	20.8	22.4	31.0	28.1

与中国经济活动的低技术含量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才严重外流^②，核心技术基本掌握在国外资本手中，国内企业创新弱。例如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中兴通讯被制裁一案^③，严重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不足。

（四）以中国式土地财政为代表，部分地方政府失控行为成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自由竞争，政府应当重视竞争规则的制定，而不是与企业直接竞争，这是传统经济理论“政府充当守夜人”的思维。伴随着德国、日本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包括凯恩斯主义的广泛传播，国家干预从宏观经济扩展到微观层次，如实施产业政策，也已经日益被人们所接受。但政府维持超脱地位，促进企业平等竞争，并在竞争中壮大，始终是市场经济理论的主流。中国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现在强调党对政府和企业的一元化领导，归根到底是为了企业在竞争中壮大，政府该放手时要放手。然而现在来看，很多场合政府特别是政府官员个人会在追求局部和个人利益时超出必要的界限，从而成为宏观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中国式土地财政推动的城镇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就是最突出的例子^[40]。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不乏政府官员集体寻租的现象。如 1980 年代的官倒^[41]、1990 年代的国有资产流失^[42]，进入 21 世纪后，房地产则成为政府官员寻租的主要对象^[33]。

虽然从形式上看,土地出让金在相当程度上转变成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但它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城镇居民的居住权益为代价?是不是一定要以国民经济的结构重大失衡为代价?答案显然是否定的。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出现趋势性的下降(见表4)。

表4 2007—2017年中国GDP增长率(%)^①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经济增长率(不变价)	14.2	9.7	9.4	10.6	9.5	7.9	7.8	7.3	6.9	6.7	6.7

四、中国奇迹延续的特点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趋势性下降表明,中国奇迹已经到了转型的关口,原有的雁形分工模式不再有效,必须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其基本内涵无非是向发达经济体学习,依靠技术创新走内涵型经济增长道路,依靠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获取体制的竞争优势。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实现技术进步必须从技术引进为主过渡到自我研制为主;生产模式引进不具有竞争优势,必须扬长避短形成新的制度安排;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外需不足必须内需来补。与韩国相比,经过30~40年的努力,日本的赶超战略显然较为成功。2001年,日本平均预期寿命为81.1岁,超过了美国的77.5岁^②。表5也显示,1990年前后日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韩国则至今都在追赶美日的过程中^③。然而由于时空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转型最有借鉴价值的则是韩国,因为韩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更接近。

表5 日本、韩国、美国1990—201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美元)

年份		1990	2000	2005	2010	2015
人均国民总收入	日本	27560	34980	40560	43440	38780
	韩国	6480	10750	17790	21260	27250
	美国	24150	36070	46340	48950	56070

比较考察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变动轨迹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如韩国稳健,在韩国经济于高位继续抬升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半途夭折的危险。表6显示,从绝对值看,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069美元,低于2000年韩国的11948美元,但由于购买力变化的关系,我们很难讲中国落后韩国15年以上;如果选择相对数据来反映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则情况会好得多。以美国、日本为参照系,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14.36%、日本的23.41%,这一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1990年的韩国,相当于韩国80年代初的水平,因为1990年,韩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占美国的25.72%、日本的22.26%(日本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经济一直陷入停滞,因此,现在对日本的相对值是偏高的)。问题是,在整个1980和1990年代,韩国经济增长脚步丝毫不减,表7显示,包含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1991—2000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然高达6.1%,1990年为9.27,1999年为10.9,2000年为8.71,此后虽然有高有低,但并没呈现趋势性下跌,而是显得很有抗挫能力,反映的是与自然增长率相关的国民经济实实在在的增长。反观中国,从2007年开始国民经济增长就呈现趋势性下跌,而且至今没有反弹迹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当前的趋势性下跌并非简单因为技术瓶颈产生的经济放缓,早在2007年,雁形产业发展模式在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效了,中国需要比韩国早20~30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表 6 世界典型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国家	人均国民总收入 ^⑧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①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中国	320	840	1740	959	1753	4561	8069
巴西	2800	3650	3460	3739	4770	11224	8757
印度	390	450	720	439	707	1346	1613
日本	26960	35280	38980	38532	37218	44508	34474
韩国	6000	9790	15830	11948	18640	22087	27105
俄罗斯	/	1720	4460	1772	5323	10675	9329
美国	23330	34400	43740	36450	44308	48374	56207

 表 7 韩国 1990—2016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⑩

年份	1990	1991—2000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中国	3.55	10.3	7.1	8.29	7.5	8.15	9.75
韩国	9.27	6.1	10.9	8.71	3.0	6.55	3.1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中国	9.95	10.89	11.43	12.64	9.38	9.05	10.50
韩国	4.68	3.99	5.1	5.07	2.27	0.28	6.41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
中国	9.30	7.65	7.69	7.3	6.9	6.7	/
韩国	3.63	2.29	2.94	3.3	2.7	2.8	/

五、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回顾与分析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就进入人们的视野，只不过不同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不同而已。1989 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即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节约资源提高效率。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十一五”期间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010 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将“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定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向高潮。《决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然而，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特别是作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基础的制度创新，从目前来看，还是难以跨越的一道鸿沟。（1）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是传统计划经济残余的产物。苏联 70 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传统计划经济就是等级经济，权力越大，可以支配的资源越多，可以分配的收入规模也越大，在这种计划经济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必然是经济资源（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向部分官僚集团倾斜。反映在收入分配上就是收入向部分官僚集团集中，社会贫富差距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几乎高于所有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仅次于动荡不定的少数

发展中国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2) 既得利益集团与政权的紧密结合使其更重视权力垄断致富而不是市场竞争致富,这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官倒、90年代的国有资产流失挖的是社会主义墙角,21世纪的房地产则是既得利益集团与政权紧密结合利用权力垄断致富的最好例证。房地产是资金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很少,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依靠房地产崛起的,而且高房价也没有在哪个国家实现共赢,但它们都在中国已经现实存在二十年了,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它较好地满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需求。(3) 经济增长方式的提前转型加大了中国经济赶超的成本,也延长了中国经济赶超的时间。经济发展与资本一样,都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积累越充分,经济发展越稳健。中国比韩国的经济转型提早了30年以上,虽然中国携经济和人口规模优势,但毕竟先天不足,这需要中国的经济转型步子更稳,准备更细致,考虑问题更周到,追赶的过程要更有耐心和恒心,不宜盲目拔高中国的发展阶段^④。(4) 经济赶超的阶段性成功增加了中国制度创新的情性。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外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然结果。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已经改变了许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被人们认为是中国奇迹。但中国奇迹的延续需要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如果不能居安思危,像城镇住房保障研究一样不以问题为导向^[43],就会陷入杨小凯所谓的“后发劣势”,即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技术,快速发展经济,缺乏改革制度的动力,从而牺牲长久繁荣的机会^[44]。

技术创新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高度重视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无论是技术政策还是财政经费,每年创新投入都在增加。但由于技术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必然延伸,如果制度创新不到位,技术创新会跟企业投入特别是政府财政投入很不成正比,普遍在协调性、权威性和连续性上出现问题。例如,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时,企业和政府都过于重视引进外资,而真正改善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根源在于企业的重点不在长期行为,而是眼前的短、平、快收益,这注定了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45]。又譬如,国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科技政策的过程中,部门之间的权利分割和利益争夺经常阻碍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具体包括专利与拨款、政府采购与外包、产业化与研发投入、合作研究计划与企业创新能力、公共服务与科技信息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与行政措施等^[46]。

技术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它们都是系统工程。特别是制度创新,它直接涉及当前中国各阶层、各团体的利益调整,难度更大,贸然调整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李克强总理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困难再大也得克服。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趋势性下滑已经持续10多年,用所谓的“三期叠加”(即中国经济正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阵痛调整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还不能完全解释。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迟迟不能实现转变,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的势头就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就有可能在越来越低的经济增长率中衰竭,像巴西、南非、俄罗斯那样从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重新跌入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

六、中国奇迹延续的前景评估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无非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成功,其标志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再趋于下滑,直至稳健回升;一种是失败,其标志是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或快或慢地下滑,直到趋于停滞甚至产生经济萎缩。如果是后者,考虑到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预期中国经济规模总体仍在增长,但后劲会越来越小。鉴于到目前为止,人们尚难断定经济已经L型企稳^⑥,中

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应该还没有开始转型。联系制度创新的重点和难点，未来中国奇迹能否延续可以重点观察以下四个方面。

（一）建立简政放权、运作公开的中性政府

辽宁贿选案^⑤的主要教训不应是谁有权主导、操纵选举结果，而应是要扩大选举范围，减少选举环节，增加贿选成本，使选举结果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只有权力足够小并且受到监督，建立简政放权、运作公开的中性政府才有可能。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深化改革的任务还没完成，部门利益、局部利益有时候异化为个人利益甚至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活力。中国需要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建立中性政府。中性政府并不影响宏观调控职能的履行，也不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更不影响促进微观主体迅速壮大的企业政策的制定，关键是一切有法可依、有据可凭，杜绝寻租，公平透明。目前围绕权力获取、权力运作、权力交替发生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被发现惩处的也许不多，但它已能说明建立中性政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还有很大的困难。当经济动能每况愈下时，分散权力，增强竞争，激发经济活力，延续改革开放的一贯思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二）建立机会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和代际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

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影响的不仅是内需，还有激励机制的有效性。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告诉我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内需对小国也许不重要，但对大国并非如此。必要的内需规模有助于新技术、新企业和新产业的孵化，有利于本国产业结构的顺利高度化。当前中国基尼系数高居世界前列，虽然由于人口基数大，内需绝对规模还算可观，但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没有充分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对激励机制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最主要体现在机会的不公平而不仅仅是结果的不公平^[31]。传统计划经济的特权属性导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源向官僚集团倾斜，产生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25]。这种财富的分配不公平与产生它的权力不公平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当代社会收入分配机会的不公平，加剧了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因此，如何给每个人提供收入分配的公平机会，建立代际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是摆在政府面前最大的一个难题。

（三）建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机制

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政府和国有企业如何实现政企分开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各的活动区域，各有各的有效边界，也各有各的业绩评价标准，因此并不存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问题。但在政府职能尚未科学规范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就很自然越过边界，也很自然利用政府的行政垄断势力和民营企业进行不对等竞争。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垄断政府牵头资助的技术创新成果，恶意阻止其扩散应用，将技术创新效益降到最低。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固然财力雄厚，人才济济，但如果自身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反而垄断政府创新的技术成果，就会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绊脚石。如何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如何在技术创新中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有的作用，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又一个难题。

（四）教育科研强化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科学性

中国顶尖人才流失居世界第一^⑥，说明中国不缺技术创新的人才。专家变“砖家”^[47]，说明中国创新的体制性缺陷严重。中国的教育科研应该强化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育科研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教条地宣传、解读政策。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利益是与生产力发展方向一致的，只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当前，教育科研部分脱离了科学性的范畴，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新时代下，我们应该比过去更有自信面对和解决各种问题，坚持科学性，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意识形态建设。

七、结束语

中国奇迹已经被人们议论二十多年了,中国奇迹的内涵也随之不断深化。从现在看,由于起点很低,中国奇迹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阶段性成功现象。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实际上就已经面临转型、不进则退的问题。但2007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速下跌趋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创新机制还没有最大限度地建立起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 展的动能还比较小。今后,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须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建立中性政府,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分配秩序,坚持教学科研的科学性,必须认识到没有有效的体制创新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 技术创新。相信有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作支撑,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十四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来越宽广,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实现彻底转变,中国奇迹必将散发更耀眼的光芒。

注释:

- ①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7》及其简单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年出版, <http://192.168.1.114:8020/zgtjnj2017/zk/indexch.htm>。
- ② 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 2003》及其简单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http://192.168.1.114:8020/05tjnj.htm>。
- ③ 参见《七成国内市场被外企垄断 高端医疗器械亟待国产化》,2018-06-08, http://www.yiqi.com/news/detail_1278.html。
- ④ 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 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年出版, <http://192.168.1.114:8020/gjtjnj2017/zk/indexch.htm>。
- ⑤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年出版, <http://192.168.1.114:8020/zgtjnj2014/indexch.htm>。
- ⑥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年出版, <http://192.168.1.114:8020/zgtjnj2016/indexch.htm>。
- ⑦ 付美斌:《海口一男子持刀砍伤十名小学生后自杀身亡》,2016-02-29, http://www.china.com.cn/legal/2016-02/29/content_37899491.htm。
- ⑧ 盛若蔚:《我国流失顶尖人才数居世界首位》,2013-06-06,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06/c1001-21753651.html>。
- ⑨ 郭晓峰:《中兴通讯董事长首谈美国制裁:立即使公司进入休克状态》,2018-04-20, <http://wemedia.ifeng.com/57349512/wemedia.shtml>。
- ⑩ 1990 年和 2000 年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 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数通电子出版社 2006 年版, <http://192.168.1.114:8020/gjtjnj2005/indexch.htm>; 2005 年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 2006/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http://192.168.1.114:8020/gjtjnj0607/indexch.htm>。
- ⑪ 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 2003、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2003 由国家统计局出版社出版,2006/2007 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其它均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数通电子出版社出版;由于各年年鉴数据不一致,本表取其算术简单平均数。
- ⑫ 胡鞍钢:《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超过美国》,2015-01-13,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50113/174221288711.shtml>。
- ⑬ 李克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再深的水也得趟》,2013-03-17,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3-17/4650201.shtml>。
- ⑭ 金煜:《中国经济企稳的幕后推手是谁》,2018 年 12 月 13 日, https://pit.ifeng.com/a/20170711/51410264_0.shtml。
- ⑮ 政知见:《在这场震惊中央的辽宁贿选案中 涉案“六虎”已全部过堂》,2018-12-14, <http://news.sinovision.net/politics/201811/00453311.htm>。

参考文献：

- [1] 任岗. 中国经济奇迹——一个诺贝尔奖的诱惑——吴焦苏潜攻“弗里德曼难题”[J]. 浦东开发, 1995, (6): 42.
- [2] 俞新天. 中国“奇迹经济”的奥秘[J]. 金融信息参考, 1996, (3): 32.
- [3] 宋德勇. 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奇迹”的一种解释[J].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3): 73-76.
- [4] 李绍祝. 中国奇迹的四个关键因素[J]. 经济月刊, 2003, (8): 64-65.
- [5] 徐湘林, 李国强. 改革战略与中国奇迹——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研究述评[J]. 经济体制改革, 2007, (6): 18-24.
- [6] 李海英. 论“中国奇迹”的充要条件——兼论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0, (1): 100-102.
- [7] 李佐军. “中国奇迹”的动因何在? [N]. 中国经济时报, 2015-01-19 (5).
- [8] 徐勇. 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1): 103-119.
- [9] 欧羽霏, 马永伟. 农民理性扩张与“中国奇迹”的生成——基于制度环境和产业选择的分析[J]. 亚太经济, 2017, (2): 155-158.
- [10] 卞思捷. 出口导向与中国奇迹：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J]. 金融经济, 2011, (8): 87-89.
- [11] 辛向阳. 中国奇迹的政治动因探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1, (4): 62-64.
- [12] 周文, 冯文韬. 中国奇迹与国家建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总结[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 (5): 27-36.
- [13] 盛洪. “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 经济经纬, 2011, (4): 1-3.
- [14] 张晓山. 廉价劳动力和土地造就了中国奇迹[J]. 农村金融研究, 2013, (7): 79.
- [15] 都阳, 蔡昉, 屈小博, 程杰. 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J]. 经济研究, 2014, (8): 4-14.
- [16] 陈书荣, 陈宇. 土地财政创造了“中国奇迹”——对中国土地财政有关问题的思考[J]. 南方国土资源, 2015, (6): 15-19.
- [17] 朱海就. 放权与中国奇迹：对“地方政府竞争论”的批评[J]. 学术界, 2016, (12): 117-131.
- [18] 林毅夫. 弹指四十年 改革开放何以创造中国奇迹[J]. 当代党员, 2018, (1): 62-63.
- [19] 乔治·吉尔博伊. 中国奇迹的幕后之谜[J].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4, (10): 6-11.
- [20] 齐物论. 中国奇迹的法式解读[J]. 经济, 2006, (3): 122.
- [21] 杨文进. 中国奇迹能长久延续吗——基于环境变迁与动力机制视角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14, (2): 15-24.
- [22] 姚洋. 稳健转型——对中国“奇迹”的一个解释[J]. 南风窗, 2004, (15): 22-24.
- [23] 尤黎明. 自主创新 赢取新的“中国奇迹”——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J]. 科技创业家, 2011, (7): 14-17.
- [24] 曹秋.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J]. 法制与经济, 2012, (5): 131-132.
- [25] 燕继荣. “中国奇迹”：成就与问题[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2, (3): 85-89.
- [26] 侯发亮. 从总供需的角度论“中国奇迹”的原因及其可持续性[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 (3): 60-66.
- [27] 蔡昉. 包容性发展延续中国奇迹[N]. 人民日报, 2015-01-30 (7).
- [28] 何磊, 姚金伟. 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奇迹的再审视[J]. 财经问题研究, 2016, (1): 3-9.
- [29] 迈克尔·扎库尔. 中国奇迹没有终结[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7, (2): 122.
- [30] 张久安. “一带一路”与中国奇迹“走出去”[J]. 公共外交季刊, 2018, (1): 30-37.
- [31] 华民. 中国奇迹到了“十字路口”[J]. 人民论坛, 2011, (16): 38-39.
- [32] 张炜. 中国奇迹能否延续[J]. 商周刊, 2010, (2): 10.
- [33] 顾书桂. 论市场经济中的民主与法治[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7, (5): 10-18.
- [34] 孔田平.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J]. 东欧中亚研究, 2001, (1): 16-21.
- [35] 王军. 土地财政的“动力结构”[J]. 瞭望新闻周刊, 2005, (37): 26-27.
- [36] 王乔, 王丽娟. 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与价格的实证分析——基于土地财政的空间互动效应研究[J]. 财贸经济, 2014, (8): 13-23.

- [37] 宋养琰. 前30年与后30年: 破解“中国奇迹”[J]. 理论导报, 2008, (8): 40-41.
- [38] 威廉·阿瑟·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 施炜, 谢兵, 苏玉宏, 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 [39] 西奥多·W.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40] 顾书桂. 中国城镇土地财政的经济学分析[J]. 宁夏社会科学, 2018, (1): 97-103.
- [41] 谢文. “官倒”等于“官盗”[J]. 改革, 1988, (5): 169-170.
- [42] 范必. 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机理与对策[J]. 管理世界, 1996, (2): 8.
- [43] 顾书桂. 中国城镇住房保障研究述评[J]. 西部学刊, 2018, (3): 17-22.
- [44] 李利明. 重新思考中国奇迹——专访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J]. 中国品牌, 2008, (3): 64-71.
- [45] 彭纪生, 孙文祥, 仲为国. 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演变与绩效实证研究(1978—2006)[J]. 科研管理, 2008, (4): 134-150.
- [46] 徐喆, 李春艳. 我国科技政策演变与创新绩效研究——基于政策相互作用视角[J]. 经济问题, 2017, (1): 11-17.
- [47] 徐瑞哲. 专家何以成为“砖家”[N]. 解放日报, 2012-08-24(3).

(责任编辑: 颜 莉)